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从清华看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

□ 陈　远

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的实践阵地

清华的一百年，不仅是它自身的一百年，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时代的最强音。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的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不能否认，美国人对此确实存在自己的考虑。

果不其然，在清华建校之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根子在那里，其他如王世杰、梅汝　、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从这些人的成就与影响回想1914年梁任公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期待。那次演讲，梁启超还提出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清华精神的形成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恰逢教育界开始出现“改大潮”，1912年，中国有大学4所，到1925年，大学已达47所。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华却保留在中学程度，显然与其独特地位极不相称。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帚，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即便以胡适当时的威望，“整理国故”的提法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反对者看来，胡适此举，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背叛。针对批评，胡适一方面著文回应，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地盘，此时胡适想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在他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看来，却已经成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的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掌清华的。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最为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均与这位沉默寡言的梅校长有关。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

院系调整之后的清华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弹奏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学术界一般把1952年作为新清华和老清华的分界线。其实历史的发展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复原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挟裹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日后出任清华校长并为新清华定调的蒋南翔，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位。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决然不同的道路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至今，蒋南翔确立的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

关于院系调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除去理念层面的争议，当年的院系调整对清华确实造成了伤害，但是却成就了当时的国家需要。而在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建设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依然是早年出身清华的那些科学巨子。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清华迎来了新的起点，经管学院、研究生院、建筑学院等一系列学院先后恢复建成，尤其让清华人高兴的是，1993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在清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果，早在60年前就设有文学院和法学院且大师辈出，冯友兰、陈岱孙、梁启超、陈寅恪、曹禺、钱钟书等一大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不仅是清华的骄傲，也是这个国家的荣耀。清华希望借此，恢复成综合性大学，也希望借此向自己的传统回归。

调研札记

芬兰教育的独特模式

——考察札记之三

□ 林振义

2000年以前，没有人认为芬兰教育是世界上最出色的。2000—2009年间，在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价（PISA）”（从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三个方面，测试学生是否能够掌握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中，芬兰学生总体成绩连续四次名列世界前茅，这才引起全球关注和一致赞赏。

这些年，我们国内对芬兰教育有一面倒的肯定，认为它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人人成才”，实现了人们对基础教育的最高期盼。这次考察，通过交流座谈，通过实地参观，确实感受到芬兰教育模式具有独特之处。

一是平等的教育理念。“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是芬兰教育的核心价值。芬兰1921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1968年，芬兰议会提出口号：“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接受到相同质量的教育”。1998年颁布《基础教育法》，称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文明与平等”。全国60万名中小学生，有4000多所综合学校，平均每所学校不到150人，班额不超过20人，是典型的小校小班。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他们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排名”，家长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班上排第几名，老师也不知道。在老师眼里，所有孩子都是“好孩子”。他们这样做，为的是避免人为制造出“差生”，使之最终成为社会包袱。

二是“综合学校”体制。这是平等教育理念的体制保障。早先，芬兰基础教育体系由初等学校（小学）、文法学校和市民学校构成。学生小学毕业后随即分化，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尖子生”选择文法学校，将来上大学，当“白领”；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学生进市民学校，毕业之后上职业学校，成为“蓝领”。1950年，进入文法学校的学生只占适龄儿童的27%。芬兰政府对此深感危机，认为学校的等级制结构有违平等理念，过早分流人才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他们从1972年开始改革，把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初中部和市民学校整合为综合学校（小学加中学）；而文法学校高中部演变为新的普通高中。同时，政府将综合学校系统纳入公共财政范围，所有适龄儿童均可在任何一所综合学校接受均等的九年义务制基础教育。这样，学生在15、16岁之前就没有所谓的淘汰系统，所有学童都享有同等教育机会，接受质量一致的教育。

三是高素质的师资。正如在萨卡林梅基学校了解到的，芬兰中小学教师至少要硕士毕业，这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法律规定。教师的高素质，保证了教育的高水准。在芬兰，教师是一个“基于研究的职业”，教师必须深入了解所教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必须以研究者的态度看待教学工作。也就是说，芬兰的教师都要求是研究型教师。各教育机构免费为教师提供培训甚至攻读学位的机会 。芬兰没有独立的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下设教育学院。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知识面宽，知识结构合理，教育创新能力强。在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教师，社会上最受尊重的职业是教师。

四是地方和教师的自主权。芬兰每4年制定颁布一次全国核心课程大纲，规定公共科目和课时分配，至于教什么、何时教、怎么教、采用什么教科书，完全由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和教师自行决定。目前，芬兰综合学校低年级（1—6年级）阶段即有语言类选修课，高年级（7—9年级）阶段开设的选修课比例占总课时的22%。允许学生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进度学习，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需要到其他学校选修课程。这种自主灵活的教学安排和自主的课程选择，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也为学生将来在高中和大学自主制定学习计划做好心理上和经验上的准备。

五是“不分年级制”。这是芬兰高中普遍实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取消了年级划分，学制极富弹性，学生在2至4年的高中阶段无需留级或升级，只需根据自己的学习计划选择课程以安排学习进度。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固定班级授课模式，将主动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纳入教学过程之中，最大限度适应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了学生的不同倾向、爱好和发展要求的需要，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

芬兰的教育模式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的，他们不仅在实际教学层面注重研究性的教学和学习，在国家层面同样在不断研究和反思，不断完善教育模式。2012年的PISA评估，芬兰学生成绩由名列前茅下滑至第12名，在芬兰国内引发热议。当然，这也要辩证地看，PISA成绩榜重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加入。2012年排行榜前7名是：上海、新加坡、香港、台北、韩国、澳门、日本。唐校长说，东亚学生在目标明确的测试中，肯定占优势，关键在于我们教育看重的是什么，是关注现在的学业成绩，还是将来的创新能力。芬兰人不这么看，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落后。他们反思之余，于2014年2月推出基础教育改革方案，分别从“社会中的能力与学习”和“学习动机、学校满意度以及教学方式和方法”两方面着手改进基础教育。芬兰教育部还安排了网络问卷调查及区域研讨活动，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对芬兰基础教育改革的讨论，提出见解，以完善这一改革方案。

芬兰教育模式是与芬兰的国情相适应的。芬兰文化中有一种重视教育、重视读书的基因。由于国内资源匮乏，又处在俄罗斯和瑞典两个“大国”夹缝中，芬兰深感国家的生存发展系于500万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他们没有资本放下任何一个孩子。芬兰法规规定，每一个生活在芬兰的人（包括外国人和难民）都有权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政府必须保证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以满足其能力和发展的需要。为此，芬兰政府舍得为教育投资，2014年人均GDP 4.95万美元，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6.6%。芬兰工业化进程较晚，二战后向以教育和研究为中心的后工业型社会快速转变，现在处于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前列，与发达的教育分不开。

我们国内有人提出“中国教育为什么未能向芬兰看齐”。其实，历史不同，国情不同，教育模式自然不同。芬兰教育模式在芬兰行得通，有些方面在中国未必行得通。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取人之长、察己之短，一定能够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需要的教育模式。

普及国学文化 传播国学智慧

“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启动仪式近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活动以“普及国学文化，传播国学智慧”为主题，旨在向领导干部广泛普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丰富的国学经典中汲取和领悟修身做人之道、为人处事之道、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及治国理政之道。增强领导干部对国学的温情、敬意、尊重和认同，同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打牢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领导干部为官为政的根基，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养及治国理政的能力。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致辞中说：国学是我们成长的基本养分，学习国学是我们成长的基本要求。古人说，圣贤由学而成，道德由学而进，才能由学而得；国学记述了前人对自然和艺术的思考与认识，记述了前人治理国家的技术与思想，记述了前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生智慧之学；领导干部学习国学，可以从中领悟修身做人之道、为人处事之道、知人用人之道、为官为政之道和治国理政之道。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自觉地学习国学，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践于行，那就能够大大地加强我们领导干部的队伍建设。当前，全党正在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实际上涵盖了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的多个方面，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内在规律和外在约束的有机统一，是当今历史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继承。“领导干部学国学全国行”活动，对推动领导干部学习国学、运用国学无疑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曹颖新）

为法国人的简单点赞

□ 车　耳

2015年大年三十前一天，来华游学的法国青年小奥遭遇不幸，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专程从法国赶来的小奥父母替儿子做出捐献器官决定。法国人的习惯是，一个人如果生前没有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过拒绝捐献的意愿，则可以视为同意死后捐献器官，尤其是有直系亲属做主的情况下。笔者由此想起在美国的经历。

我也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纽约州驾驶执照考试，竟然一次就通过了。当我拿到驾驶执照时开心大笑：在美国考驾照居然如此容易。但是驾照背后一个表格让我纠结，那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签名表，上面写着：“一旦我去世，自愿捐献器官”。表格下面还有一个选项，可以选择捐献全部，也可以选择捐献部分。一个信用卡大小的驾照竟然写了这么多内容，全部是捐赠。

看过表后我犹豫过，没有在上面签字，之后为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做法而纠结。我吃惊美国人这么直截了当，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国家驾照这样写过。不过，你不得不承认，在驾照后面签字是遗体器官捐赠的最好方式，因为这个东西随身携带，而驾车又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为。一旦出事，医院凭借这个签名驾照就可以动手切割逝者器官而无须背负法律责任。如果每个人这样做的话，社会上的供体就会大量增多，被挽救的生命也会大量增多。如果是现在，这个字我愿意签了，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感动。

安利创始人狄维士在71岁高龄时获得器官捐助、被移植了一颗健康女人的心脏，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手术后还有机会见到活着的捐赠者。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伦敦，捐赠者是因为肺不好需要移植，幸运获得同一人捐赠的心和肺两个器官，而心肺最好相匹配，她的心脏与捐赠者的肺不完全匹配，于是便腾出自己的心脏捐赠给了狄维士。这两个手术同时在一家医院进行，所以这颗心脏只离开那位同样在做移植手术、活着的女士身体20分钟就移植到狄维士体内，女性心脏维持了他这位老年男性之后17年之久的正常生活。

狄维士在手术后和这位女士在同一处病房走廊中偶遇，惊讶地听到后者说：“嗨，你的心脏是我捐的！”于是双方热情拥抱祝贺重新获得新生。那位女士一生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灌制唱片，而狄维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种意愿帮助她，但是这位乐观的女士并未开口，直到默默去世。感恩的狄维士则将生意场上赚来的钱回馈社会，经常捐款给慈善机构。

对于捐赠和被捐赠的人，也就是供体和受体之间，国际上的惯例是不应该有钱的往来，不应该有幕后运作。被捐者要排队等候，在美国有器官分配中心，不分贫富不分级别不分年龄，一律在计算机系统内排队。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心脏一直不好，三十多岁后先后发作五次，还植入过心脏泵，他也在71岁高龄时，等待了二十个月才获得心脏移植，即便这样还遭到社会质疑，人们指责他抢占了宝贵的资源，让一些年轻而等候时间又长的患者失去了手术机会。

至于在器官移植方面，并不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因为人种不同而出现器官不匹配的情况，只要血型等医学指标相符，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器官捐赠是可以的，血液可以互联互通。法国青年小奥因此成为中国第二例跨国器官移植成功案例，他捐出的一对肺、一个心脏、两个肾、一个肝脏，一共挽救了4个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小奥父母在捐赠时也已经知道中国自2015年1月1号开始取消了死刑者器官的利用，从而和国际准则同步，所以才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捐赠就是捐赠，不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使用，即便是罪犯的器官。

摘除罪犯器官是因为我国供体严重不足，人们不愿意捐赠，不愿意自己或自己亲人的器官被不法分子和无良医疗机构拿去转卖，就像国人不愿意捐款被贪污、被层层盘剥一样。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为庞大的国家只有百分之三的急需患者能够完成移植。而在小奥之前仅仅完成过一例成功的跨国移植。

其实，令我感触的不仅是法国人的爱心和美德，也是他们的简单。在北京，有个骑破自行车的老外以血肉之躯挡住了侵占人行道横冲直撞的驾车者，双方僵持许久引来众多路人围观。难道他不知道如果被一辆车撞上，还可能遭到更大的风险？那张照片被无数人微信转发，那个外国人代北京民警维持交通秩序的事迹也广为流传。其实，这些有良知的外国人只是用一些简单行为感动着中国。

我们也希望像他们一样简单，捐赠就捐赠了，尽心就尽心了，不再去想不归我们管或者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同时希望一些管理者也变得简单，即另一种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比如当公安局长的不能自己私藏枪支，管交通治安的不能自己先挂个假车牌，维修道路的不能整天为自己的小金库而重复修路。

随想录